

关于北方干旱地区农业改革的一些看法

——胡耀邦同志在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

(1983年8月6日于延安)

这次是到青海、甘肃考察之后，路过延安。没有打算在延安考察工作，也没有想到要在你们会议上讲话。解放后，我第一次来延安是1956年4月份，在这里开五省青年造林大会。那时延安的山头，基本上是光光的。就是清凉山上有点树，枣园、杨家岭有点树，其他山上和河滩的树很少很少。昨天来一路看，我就同马文瑞同志和地委书记郝延寿同志讲，延安变了样。不但房子多了，工业多了，市区人口增加到8万，树也多得多了。延安市连郊区总共3,500平方公里，即530万亩，已经绿化210万亩，这是很大的成绩。今天上午，我同延安市委书记杨春荣同志说，如果再用10年，你们再绿化100万亩，绿化面积加到310万亩，就占总面积60%；即使这样，你还有200万亩，其中100万亩种庄稼，市郊区农业人口17万，每人平均耕地还有6亩之多，还不够吗？他后来对我说：“100万亩干不了，80万亩干得了。”我说，那也好嘛，10年干成80万亩，总共绿化290万亩，绿化面积达到50%几，那时可以成为全国第一个绿化城市。他说，我们努力办！

明天就要走了，恰巧你们在这里开会，叫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。我和你们“无缘无故，无冤无仇”，可是“狭路相逢，决不放过”，一定要我讲话。只好讲一点吧。但是有言在先，已经约定，最后由林乎加同志讲话，以他讲的为准，我讲的只是作为参考资料，“大内参”。

讲什么？就讲我对中国北方干旱地区农业改革的一些看法。我对农业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。听说在座有很多农业专家，不少还是长期在西北工作的，我讲的也是一家之言，可能同有些科学家有所不同。那也不要紧。百家争鸣嘛，你们讲错了，我不打你们的棍子；我讲错了，你们也不要打我的棍子。这应当成为一种风气。

讲五个问题。

首先一个问题：中国干旱地区究竟有多大？

卢良恕同志和刘锡庚同志讲的数目都很大，他们是有调查的。我没有调查，只能提出问题。我也不否定你们两位的。但中国干旱区究竟有多大？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划分干旱区？我的意见是需要多作一些具体分析。比如说北京地区，除了有水利设施的地方以外，那些没有水利设施的地方如百花山，你说都是干旱地区，我就不赞成。还有晋东南地区，也不能都叫干旱区。那里有个沁源县，沁水之源，基本上谈不上干旱。还有新疆天山，天池那里有什么干旱？所以，在你们划的大干旱区域内，实际上不一定全都干

旱。那种大范围地划分干旱区的办法，有一定参考价值，但是因为过于笼统，要有效地指导农业生产就不够了，就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。

其次一个问题：干旱地区要分几种？

究竟怎样细分，要靠专家同志们研究。我提一点想法，供你们参考。看来黄土高原就是一大类，包括你们陕北，还有甘肃东部和山西一些地方。这类地方，种草种树，大有可为，其中干旱程度又各有不同。另一大类是荒漠。其中又可分为几种：第一种叫戈壁干旱区，都是石头、砂砾，根本无法开垦。新疆鄯善、哈密一部分地方，几尺厚的石头，一无水，二无土。看来那种地方要开垦，也是二百年以后的事了。第二种叫盐泽干旱区，盐碱很重，水也是苦的，包括新疆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、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一大片地方，甘肃、宁夏的某些地方。那种地方很难种粮食，种骆驼刺大概可以，沙打旺可不可以？第三种叫沙区缺水区，多沙无水，或者缺水。第四种叫沙区有水区，例如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一带，还有新疆、甘肃、宁夏一些地方，虽是沙荒，但水源丰富，草、木照样长，而且可能长得很好。至于更加高寒的地区，也应细分。海拔3,000米以下的，有些地方石头很大很多，又干旱，可以叫石山无土无水的干旱区；但也有些地方，石头不那么多，不是戈壁，可以叫高原沙石干旱区，或者半沙化干旱区，等等。海拔3,000米以上的，又可分几种，其中雪线以上的，种草种树都活不了。所以，对干旱区，应当一个地区、一个地区地实行普查，最好一个县、一个县地普查清楚，并在普查的基础上，过细地加以划分。不应当停留在大而化之的区划上面，那种分法不能对症下药。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，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。农业工作包括干旱地区的区划工作，也应当这样。至于究竟怎样划分更科学，究竟分几类几级为好，我没有研究，还要请你们过细考虑。

第三个问题：干旱区究竟是怎么形成的？

你害的什么病，病是怎么来的，不弄清病源，就弄不清治法。人治病是这样，地球要治病，例如干旱地区的治理，也是同样道理。要治理干旱，就要弄清干旱区究竟是怎么形成的？

干旱区的形成，大自然中各种因素的亿万斯年的作用，固然是基本的原因；但就许多地区来说，就许多具体情况来说，人为因素的破坏肯定也是重要的原因。我们看到地球上许多地方，都是曾经有草有树，并且经人开发出来，后来又破坏了的。比如我们的华北、西北许多地方，多少年前，草地林地非常之多。前年我到山西，我问他们看过柳宗元的《晋问》那篇文章没有？柳宗元是山西永济人，《晋问》专讲一千多年前山西的风貌，说当时晋北到处都是森林。这次我到甘肃，原属甘肃有个额济纳旗，现归内蒙阿拉善盟，这个地方古时叫居延，是汉朝在西北的屯兵重地，当年有大片的草原，放牧牲畜，还种小麦，驻兵上万，而现在周围地方已是一片荒漠了。还有陕、甘的畜牧业，过去也都是有相当规模的。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的一位大将叫马援，是陕西人，就曾在西北搞起了很大的畜牧业，他对相马法很有研究，写了一本《铜马相法》。再早一些，

西汉武帝时的重要人物卜式，也是靠在北方搞畜牧业起家，向朝廷进贡大批马匹，封了大官。还有新疆那个历史上有名的楼兰国，曾经很繁盛，但是后来毁掉了，完全沙化了。什么原因？远的原因不清楚，但频繁战争和滥伐树木，草原森林被破坏，无疑是个重要原因。还有陕北榆林一带，原是干草原地带，自从清朝康熙时期毁林开垦以后，暗沙变明沙，沙丘南移，榆林城自清初到解放前250年间被迫三迁城址。

所以，北方干旱地区的形成，原因可能很多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为的破坏，是一二千年来的连绵不断的战争，是滥伐森林和盲目开垦。马克思讲过：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，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（注）。我们讨论干旱地区问题，就要注意抓住这个原因，就要研究有关的历史，研究沙化和干旱究竟是怎么来的，或者为什么加剧了，而不要老是一股劲埋怨老天爷。前两年我说笑话：老天爷难当啊！不是这个省说雨少了，就是那个省说雨多了，总之怪老天爷不好，搞得老天爷年年挨批斗。你看，大家都平反了，唯独老天爷没平反，雨下多了挨批，下少了也挨批。我看不能只怪老天爷。讲干旱地区形成的原因，重要一条是几千年、几百年的人为破坏。不讲这一条，就不可能弄清由来，不可能弄清来龙去脉，害什么病和怎样治理也就弄不清楚。

第四个问题：减轻干旱、保证农业增产的根本措施和根本出路在哪里？

这个问题，你们农业科学工作者必须作出答复，中国共产党也必须作出答复。我们大家不是要改造山河吗，出路何在呢？紫阳同志讲得好，要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。那么这种良性循环，应当从哪里入手来打开局面呢？

要实现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，在我看来，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、种树。有草、有林，才能够发展畜牧，发展牛、马、驴、骡、羊、鹿、骆驼等等，才能够畜多肥多，多打粮食，也才能够促进各种农牧林副产品的加工工业，各种轻工业的大发展。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老是希望多办大化肥厂，但那要大量投资。例如30万吨合成氨，吃油气的要投资4亿元，吃煤的要投资15亿元。按吃煤的计算，搞3,000万吨化肥就要投资1,500亿元；按吃油气的计算，也得400亿元。这样大的投资，短期内能解决得了吗？所以，眼睛只盯住化肥是不行的。当然，化肥肯定要搞，特别是复合肥料，但这个东西投资大；解决中国农业的肥料问题，主要还得努力从有机肥上找出路，一是绿肥，红花草、紫穗槐、草木樨等等；二是厩肥，也叫圈肥；三是饼肥，棉籽、菜籽、花生、油茶等各种油饼。其中主要又是厩肥和绿肥。至于饼肥，最好用作饲料，让牲畜把可以吸收的植物蛋白质转化为营养价值高的动物蛋白质，然后“过腹还田”，产生厩肥肥田。现在，农家肥占70%，化肥占30%，这个比例，一个时期内很难改变。有些同志认为水决定一切，说川地有水，粮食达到500斤、800斤；山上没水，产量就很低。我说没有水只是一个原因；而山地缺肥，靠毛驴子驮一点点都很难得上去，也是一个原因。所以说良性循环，怎么循环法，第一位的东西是什么？我看第一位是草和林。草和林是哥哥，畜牧是妹妹。“兄妹开荒”，哥哥前面走，妹妹后面跟，然后才有肥料，才能生下胖娃

娃，叫粮食。良性循环也要落实，要找到具体途径。

我在兰州讲了，我认为种草种树，发展牧业，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。甘肃有45.6万平方公里，面积之大，在全国各省区中占第6位。除了新疆、内蒙、西藏、青海、四川，就属甘肃了。如果经过若干年，比如说30年的努力奋斗，甘肃达到用10万平方公里即20%几的土地来种树，那就等于是造了相当于整个江苏省那么大的一个林区。10万平方公里是1.5亿亩，如果成林之后，每亩每年出材0.5立方米，1立方米算200元，1.5亿亩出材就是150亿元。而现在甘肃的工农业年总产值不过110亿元，仅此一项，不就等于是翻了一番多吗！有同志会说，你讲的这么轻松？当然不轻松！我说的是要经过若干年，至少准备干它30年！但是必须从现在起，就有明确的目标。现在不明确，30年一下就过去了呀！回想建国时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说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”，我当时也在天安门上，因为政协委员都上了台，我也是政协委员，不过站在后头就是了。从那时到现在，34年不是一下就过去了吗？如果今天还不抓紧，那么今后30年又会一下就过去的。为什么要讲“立下愚公志”？你看我们今天主席台上这一排，大概都干不到30年了。但是在座有许多年轻的，你们接着干下去嘛！总之不能耽误。耽误一年就是犯一年错误。从现在起就要下决心，明年起就要抓紧动手，种草种树。

讲种草种树，当然不是说要把宜粮地让出来。你西北的山坡、荒滩多的是嘛。陕北两个地区，榆林4.4万平方公里，延安4万平方公里，合起来8.4万平方公里，比两个台湾还大，而人口只有400万，延安160万，榆林240万，你们地多的是！这几年延安种草种树搞得很好，榆林也很好。1980年8月我到榆林去了一次，开了个会，我说今年是1980年，如何迎接1985年？我就用“1、9、8、5”给他们提了个希望。什么叫“1”？一户1头牲口。什么叫“9”？一户9亩草和林。什么叫“8”？人均800斤粮食。什么叫“5”？人均5头羊。合起来就叫“1、9、8、5”。昨天我问他们，他们都记得，说“1、9、8”都可超过，有些地方已经超过了，只有那个“5”完不成。我说完不成不要紧，可以减一点，改成“1、9、8、2”，或“1、9、8、3”，如果能完成，也就很好了。

归结起来，种草种树的好处，第一可以富起来；第二是以草以林促畜牧业，以草以林促粮食；第三可以促轻工业，促食品工业，促乳品加工、皮革加工、水果加工、干果加工、木材加工等等；第四还有助于促天老爷，改变他“瞎指挥”、分配不均，改变气候。此外，还有一条，有利国防。林多了，打起仗来可以藏游击队，不是几万游击队，而是几十万游击队。这是对付侵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。你们知道苏联的卫国战争，在乌克兰、白俄罗斯就有几十万游击队躲在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。所以说，种草种树，确实是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一环，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，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。

这个问题，我们讲过多少年了。感谢延安地区、榆林地区的同志们重视了我的意见，也重视了省委意见。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同志不通，某些干部不通，某些科学家不通，这有什么办法呀？还是百家争鸣吧。但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同志们，搞通这个问题。小平同志前年就在甘肃讲了要种草种树。小平同志79岁了，他说只要自己动得了，每年要亲自种几棵树。这个用意很深！顺带再说一点历史情况，1956年来延安开造林大

会，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。当时我代中央起草了一个给大会的贺电，送毛主席审阅。主席批给少奇同志，请他看并帮助修改。少奇同志第二天就叫我去，说你那个电报好是好，是不是太长了一点，700字，中央贺电从来没有超过三四百字的。我说这次中央不去人，那里离北京这么远，长一点好。他说那也好吧。他还建议加一条水土保持，并说你们搞黄土高原造林，为什么不请河南、河北的人去？后来就加上了一条水土保持，并请了河南、河北的人参加。这是一段革命小故事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中国要抓住种草种树这个重要一环，经过若干年努力奋斗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30年还不够就40年，搞出点名堂来，这样来促进农业面貌的改变，促进国家自然面貌的改变，促进国家经济面貌的改变。一改带几改，一个改革带动几个改革，一个改变带动几个改变。

第五个问题：种草种树，要有什么办法和措施？

这里提十条措施。

第一条，思想大解放。多年来我们有个老框框，就是怕没有粮食。越怕没有粮食，就越要单打一地抓粮食；但越是单打一地抓粮食，结果就越没有粮食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看来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，或者索性说：来一个思想大转变。我在甘肃讲过，我说你们《丝路花雨》不是有一个“反弹琵琶”吗？人们弹琵琶，一般放在怀里，《丝路花雨》却拿在背后弹，所以叫“反弹琵琶”。由此得到启发，我当场作了两句打油诗：“甘肃农业要开花，来他个反弹琵琶。”就是说，象甘肃，还有青海这类地方，索性把粮食自给这个问题暂时放下，不要老觉得粮食问题压力很大，老是只想着甩掉吃调入粮这顶帽子。甘肃、青海每年调进些粮食，我说那不要紧，按你们调粮的那个指标，国家一斤不少给，保证你们这些地方主要抓种草种树，发展牧业。当然，你们不要误会我这个话，以为可以放松粮食生产。我的意思是要抓种草种树，发展牧业，由此增加肥料，增产粮食。这样四个环节都要抓，而就你们这些地方的现状来说，首先要抓的一个环节，是种草种树。草、林搞上去，畜牧业就上去了，肥料就上去了，粮食也就一定能够搞上去。中央讲过“决不放松粮食生产，积极发展多种经营”，多种经营上去了，粮食生产也就搞上去了，这才是辩证法嘛。所以一定要来个思想大解放，狠狠地抓紧种草种树。最后的目的，是经过种草种树，发展牧业，达到粮食大增产。这就叫“反弹琵琶”。这一点，我觉得延安地区、榆林地区做得比较好，还有些地方比较好，有些典型比较好。

甘肃定西地区通渭县申家山大队，从1979年起，抓了4年种草，结果农牧业都大得其利。在1981、1982年定西地区严重旱灾的情况下，这个大队却逐渐进入盛草期，收入稳步上升，同时粮食产量也稳步上升，产粮比附近队高1/3。他们人均5亩粮、4亩草，农业收入占四成，草畜收入占六成，今年人均草、畜收入就可能达到200元。这个大队是谁带头干起来的呢？是一位名叫王素香的，省草原工作队的女畜牧师。她30多岁了，曾被错划右派。现在申家山男女老少都叫她“老师”，因为她做了大好事，大家离不开她了。这类好经验，还有不少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甘肃中部18个干旱县中，有70%以上都是类似申家山这样的山地。可见只要路子走对，潜力大得很！

《老子》有一句话讲得好：“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”西北许多地方的大地，现在

很贫乏，缺乏有机质，它喂不起我们了。这就要求我们，一定不要再搞那种掠夺式经营，一定要来个思想大转变、大解放，转到在一定条件下“先予之、后取之”，狠抓种草种树。没有这样一个转变，良性循环是实现不了的。

第二条，意志大集中。就是要把大家的意志，集中到一点上：在北方干旱区，特别是在土地多的地方，狠抓种草种树，把它摆在第一位。围绕这一点来统一思想，引导大家讨论清楚，并且作出相应的决定，使大家想到一块，一起这么干。意志不集中，你讲一套，我讲另一套，你是这样干，我是那样干，象陕北同志说的“尿不到一个壶里”，那不行。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要意志集中，不能各行其是嘛。

第三条，广泛大动员。所谓广泛，就是要党内党外都知道，男女大小都知道。还要深入，就是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。还要持久，就是要坚持不懈，不能这次开罢了会就万事大吉。明年要讲，整个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要讲，二十一世纪还要讲。什么时候不讲了？完成任务就不讲了。大动员，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讲得通通俗俗，生动活泼，并且提出恰当而又鲜明有力的口号。现在我们有些东西，“洋话”太多，老百姓听不懂。例如什么“植被”等等，他听了会想，棉被都没有，要什么“植被”？！所以要请你们注意，务必讲得通俗才好。这次我在甘肃提了几句话：“种草种树，治穷致富”，或者叫“种草种树，巧干致富”。我还说：“十亩草山二亩林，子子孙孙不受穷。”另一句是：“两头大畜十头羊，光景一年定比一年强。”这是指一户。人均两只羊，五口之家就是十只羊。这类口号是否适当，请你们研究。陕北历史上有个李自成，叫李闯王，他的口号是：“迎闯王，不纳粮”。你看，只有六个字，大家就跟着他造反了。我们革命战争时期，毛主席也提过一个著名口号：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。也是六个字，使亿万人跟着我们走。所以口号一定要通俗易懂，并且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。如果不能紧密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，只说什么“改造山河”啊，提的蛮高，但是曲高和寡，动员力量就不大。你们陕北不是有个韩起祥吗？此人善于说书，人人欢迎，因为他说得生动活泼。我们过去有些戏也是生动活泼的，如《刘巧儿告状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等等。现在有些地方的宣传之所以不能打动人心，不通俗、讲“洋话”、讲套话是一大毛病。

第四条，事情靠群众。种草种树这件大事，主要依靠谁来干？主要靠发动群众，靠千家万户，千军万马。国家要拿一点钱，但一定要以发动群众为主，国家财政支持为辅。我们大家都要想通一个问题，就是办事不能一切靠钱来推。养成这个坏习惯，许多工作都推不动。现在有的地方，党员开支部会都要花钱，这就把风气搞坏了！

应该弄清楚，领导工业和领导农业有很大不同。领导工业要有国家投资，花很多钱，如一个宝钢，一个大化肥厂，没有大量投资怎么能行呢？而搞农业则主要是靠发动群众，靠用政策来调动千家万户、千军万马的积极性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许多领导农业的同志想不通，总是想靠国家投资搞大工程。一到北京开会，就是找什么主任给点钱啊，上个什么水利工程啦！当然，不是说不要花一点钱，钱总是要花一点。在那些适宜兴办水利的地方，如河西走廊，办点水利是必要的，国家可以给点支持，以利于增产粮食。尤其是对那些困难地方，如定西地区，用适当补助办法，支持种草种树，扶助几年，让他们缓口气，也是完全必要的。问题不在这里。问题是在我们有些同志，对于指导方针和工作方法没有搞通，没有想到应当主要依靠发动群众。我们国家的“七五”、

“八五”、“九五”计划，资金主要只能用在能源交通和其它骨干工程上，农业上不能花很多的钱。而且农业那一点钱，还要用得恰当。那种没有效益、劳而无功的工程，切不可再搞了。比如你们延安，我不是算你们的老帐，但你们过去搞水利工程花了两亿多元，才搞了50万亩水浇地；如果把这两亿用在造林上，你们翻身会更快。这就是一个教训。所以，你们今后指导农业工作的重心，必须明确，就是要发动千家万户、千军万马，种草种树，发展牧业。就是要多想草木，多做草木之梦。古汉语中，灌木叫“莽”，种草种树可以说就是要当“草莽英雄”。如果你们不做“草木之梦”，只梦那个龙王爷，不想当“草莽英雄”，只想当“东海龙王”，一心只想搞水利，那就想到两下里去了。

第五条，种子要狠抓。现在种子不够，包括草种和灌木、乔木的种子。要实行草、灌、乔混种，或者草、灌混种。听说你们这里适合种四种草：沙打旺，草木樨，红花草，小冠花。就一个县来说，你那里适合种什么，先种什么，后种什么，都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，具体安排。比如灌木，就有红柳、花棒、柠条等等。乔木，就有松树、杨树、刺槐、柳树，以及盖房用作椽子的椽柳，等等。松树一项，又有油松、马尾松、华山松、雪松等等。你本县、本地区或本省适合种什么，要开个名单，可以编成《草木百家姓》，如同“赵、钱、孙、李、周、吴、郑、王”那样，什么“枣子、枸杞，苹果、板栗”，一个个地编。这样既可教老百姓识字，开发智力，又有利生产。现在一个重要问题，是广收各种适合需要的草种、树种。据说沙打旺种子，1斤卖到4块钱。这我倒也不反对，越卖的贵，身价越高，种沙打旺的积极性就越高。种子不够的问题，空军同志们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，他们说愿意出动飞机播种，但是缺种子。据说种1亩沙打旺只要4两种子，而1亩草木樨要2斤，所以要认真解决种子问题。

我已经同王兆国同志商量，请团中央发动全国青少年，来一个采集草木种子，支援甘肃改变面貌的活动。通过这个活动，不但可以为支援甘肃、支援西北，为绿化祖国做贡献，而且可以向全国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。现在我们许多地方搞的思想教育工作太空洞，太抽象，要想办法加以改进。比如“热爱祖国”的教育，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具体事情来搞。共产主义教育，社会主义教育，爱国主义教育，都要结合具体事情，才能搞得生动活泼，深入人心。一个青少年一年采集一两种子，全国只要1.5亿青少年参加，一年就是1,500万斤。当然，大城市如京、津、沪可以不搞，它那里草木很少。还有南方各省，采集的种子不一定适于北方，可以自采自用。只要认真抓，种子问题是不难解决的。

第六条，技术要跟上。一个地方种什么草，种什么树，以及怎样种法，都需要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之下，过细研究，具体落实，保证质量。比如草、灌、乔如何结合，就是一大问题。只种乔木不行，因为只种乔木，保不了水土，还得灌木和草陪衬。“红花虽好，还要绿叶扶持”，“红花”就是乔木，灌木和草则是扶持红花的“绿叶”。有些地方还必须先种草，先种灌木，然后乔木才有可能慢慢长起来，灌木有好多种，有些灌木是满地爬的。在南斯拉夫看到有一种爬地松，爬在地下，一颗松树就是一片。北京玉泉山上的迎春花，种下去也是一片。

有些同志说他们那里想种树，可是没有水，种不成。这有一定道理，但不完全。这

次到刘家峡去，郑维山司令看到一个山头上孤伶伶地长着一颗树，他当众问大家，那棵树是怎么长起来的？所以说没有水就不能种树，就许多地方来说，不一定能成立。有些地方种树，采取播种籽种而不直接种树苗的办法，成活率可能更高一些。还有许多地方，种树不行，可以先种草，先种灌木。耐旱的草和灌木多得很，比如柠条、沙打旺、红柳，还有干旱沙地的骆驼刺和梭梭。这就叫做从种草起步，草、灌先行，以草养畜，促林促农。这方面的经验很多，要加以总结，用这类有科学根据的实践经验，来破除那种没有水就不能种草种树的思想。此外有些地方，没有办法用人工种，还可以实行飞机播种。小平同志已经下了命令啦，空军可以支持嘛。

除了种草种树，就农业生产本身来说，紫阳同志提出的重视旱作农业的问题，也是我们农业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发展。这就要求在作物结构、品种和耕作、栽培制度等方面，进行一系列的改革。这对于整个北方干旱地区的农业发展，是一件大事。你们会议认真讨论这个问题，很有意义。

第七条，检查要认真。每年检查一次。一个一个省，一个一个地区，一个一个县，一个一个公社，一个一个大队，都要认真检查，表扬好的，批评懒洋洋的。我们有多少英雄可以表扬啊！甘肃有许多英雄，你们这里也有许多好的。别的不说，延安实现绿化40%这件事，就应当登报。你们100分打不上，85分总可以吧！我们的农业干部、研究人员、科学家，只在上边，只在北京、西安、省上不行，要深入实际，要多下去。象前面说到的甘肃通渭县申家山大队那位王素香，就很值得表扬。我们做经济工作的，做党的工作的，做科研工作的，做理论工作的，从总书记算起，都应当注意从不同的角度联系实际，深入实际。谁深入实际，谁认真研究和解决了实际问题，谁改造了环境，谁帮助人们提高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，谁就真正是好样的，就应当受到尊敬，受到表扬。

第八条，政策要落实。就种草种树来说，要落实政策：谁种谁有，长期不变，子女继承。有些地方应当扩大自留山，同时认真落实责任山。我们有两位同志这次跑到你们柳林公社的柳林大队，他们感到这个大队多年来确有成绩，可是现在还有一些政策没有落实。比如集体林的责任制，没有解决好；集体的拖拉机、推土机和汽车，使用、保养和效益也有不少问题，卖给社员又怕说走资本主义道路。可见各地都还有政策不完全落实的问题，即使工作较好的地方也不例外。千万不要以为这方面已经无事可作了。要注意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，我们搞社会主义，脑子里一定要有“两个富”：国家富，人民富。一定要把是否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兴旺发达和人民富裕幸福，作为检验自己一切工作对或不对的标准。离开这一条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！所以要继续坚决落实政策。牧业政策要坚决落实，林业政策要坚决落实，各种责任制都要坚决落实，大胆地和尽快地落实好。

第九条，干部要带头。我在甘肃讲，你们定西这么干旱，别的意见我不提，只提一条：要书记带头，一人一年种两亩草，十棵树。为什么对别的地方干部不这样规定？因为你们是在定西这样的干旱地区工作嘛。延安也要规定，国家干部一年种多少草，多少树。毛主席不是提倡种试验田吗，我们现在种试验草。毛主席告诉我们，只要带头干，总会感动上帝的，上帝就是老百姓。我们包的山，种的树，种好了有的还可以送给老百

姓。我说这一条是最过硬的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抵不上干部带头干。种一亩苜蓿草有什么难？无非是多流点汗。二亩实在完不成，就种一亩；一亩完不成，种半亩。不但地方上的同志要这样，中央农牧渔业部的同志们也应当带头干。你一年种几棵树，并且交上5元钱给老乡，说老乡呀，我帮你种上树，还送给你几块钱请你照看，树长大了归你，行不行？我这只是打个比方。我的中心意思是，要拨乱反正、开创局面，我们必须带头干。不带头干没有说服力，不能感动上帝——感动人民。这一条我把它看得非常重要。煤炭部干了个好事，我去年同他们谈了之后，他们发了个通知，煤炭部系统干部，从部长起，一年带头劳动多少天。高扬文同志从去年开始，每年下井两个礼拜，同时对各级干部都有规定。既然我们现在说种草种树、发展牧业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，我看我们大家也要带头干，搞责任制。1956年我来延安开造林大会，事先想好了，光开会有什么用，大家把树苗带来，自己动手，在杨家岭、宝塔山和大瓦沟，一共造了3片林。只开会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那是孔老二的办法。共产党员应当既动口又动手，才叫真功夫。

最后一条，决心要持久。最重要的是这一条。我上面讲了，要把干旱区改造过来，10年是不行，20年看行不行，有的地方要30年，有的还要40年。这个怕什么，还是要靠愚公移山，这代人搞不完，下一代，一代两代搞不完，还有第三代。大概陕西有两代人就差不多了，甘肃恐怕得三代人，新疆三代人不够就四代，下他个决心！1945年在杨家岭开七大，毛主席最后讲了愚公移山。我们现在也叫愚公，我们不讲挖山，而是治山；绿化祖国，种草种树，发展畜牧，改造山河。要硬下这个决心，要想到这件事干得怎么样，不是小问题，而是对不对得起党，对不对得起人民，对不对得起已经去世的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同志，对不对得起后代子孙的大问题。我们想清楚了，就下决心干到底！我相信同志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党员，来延安开会，叫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，没有辜负此行，没有辜负看到了杨家岭、枣园。这叫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。你们努力，我们也努力，大家都努力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干好，一定能够干好！

（注）参见“马克思致恩格斯（1868年3月25日）”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32卷，第53页。

（上接第16页）荒沟、荒滩、荒水为民造福兴利，每年争取实现两个100万，即造100万亩林，种100万亩草，1985年造林累计面积达到600万亩，种草保留面积达到300万亩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7,200平方公里，使治理面积占到流失总面积的24%。

三是努力把现有的典型经验推广到面上去，逐步使这些先进水平变为全区的社会水平，并不断创造新的水平。

四是加强智力开发和投资。在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、创造性的同时，办好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，开展各种专业技术培训活动，争取每年培训基层干部和农民10万人左右。

五是改进领导作风，加强调查研究，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的原则，一项一项地抓，一块一块地搞，做到干一项，成一项，搞一块，上一块。我们决心在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的领导下，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，把革命圣地延安建设好。